清史研究前沿·清代边疆治理的地方视角

编者按： 嘉道时期，由于内外危机加快嬗变步伐，清朝在边疆地区管理体制也遭遇新挑战。在东北和内蒙古，是内地移民边疆带来的种种新问题，在西北新疆则是境外势力的冲击。本期刊发的两篇文章分别探讨了内蒙古东部开垦带来的地名变化，和负责在新疆管理浩汗商务的“呼岱达”与“阿克沙哈尔”之区别，从微观角度展现了清朝边疆体制在前近代所遭遇挑战的区域性差异，及清廷对边疆治理举措的调适。

清代内蒙古东部地区垦地与地名

——以科尔沁左翼后旗昌图额尔克和库都力二地为例

乌云格日勒　夏文超

[摘要] 清代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大面积游牧地的开垦完成于清嘉庆、道光年间，此时也是清廷三番五次发布开垦禁令时期。该旗开垦的启动和推进，始终伴随有朝廷批准、官方监督等各种官方文献记录在案。其中，不仅有大臣专门奏折，有些内容还被载入《清实录》；针对该旗的开垦条例，更是重墨写入典章制度类官书之中。论文围绕科尔沁左翼后旗土地开垦问题，重点讨论在满、汉、蒙古文文书之中记录不一的标志性地名——昌图额尔克和库都力，解答二地名书写不一的原因，陈述地名研究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 清代　内蒙古东部　垦地　地名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3）－03－0021－009

清代内蒙古的土地开垦从康熙年间逐步推进。土地不断从游牧地变成垦地，定居的村落、热闹的集市以及行政建置相继出现，一批批新地名也随之启用。而新地名的来历不一,一部分由音译或翻译原蒙古语地名而来；另一部分则借用已有的城镇、驿站名，或沿用前代地理名称；还有一部分采用崭新的名称。新地名启用后渐被人们接受和熟知，也以文字形式记入各种文书

[收稿日期] 2023－02－14
[作者简介] 乌云格日勒（1969—　），女，内蒙古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研究员，呼和浩特 010021；uyungerel2015@163.com；夏文超（1992—　），男，内蒙古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呼和浩特 010021；xiawenchao2018@126.com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近代蒙旗社会史研究”（20BMZ02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钦定理藩院则例》满蒙汉诸本整理与研究”（17ZDA208）。

之中。①

关于清代内蒙古的土地开垦、农业发展，学界在不同时期以不同视角、利用不同文献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周清澍《试论清代内蒙古农业的发展》，利用《清实录》《大清会典事例》等官修史书和时人记载，对鸦片战争以前内蒙古农业的发展，采取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办法，从客观条件、必然需求、应对政策加以分析讨论，可谓开创性研究成果。② 刘海源主编《内蒙古垦务研究》中的部分论文，利用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内蒙古垦务档案史料汇编》《钦差垦务大臣全宗》《内蒙古东部区垦务档案》等第一手资料记载，举例讨论清代内蒙古东、西部地区的开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史料运用有所突破。③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内蒙古历史地理④、通史类著作开始问世，其中《蒙古民族通史》将清代以来的土地开垦与农业发展置于民族地区历史变迁脉络之中加以讨论，展示了微观探讨和宏观叙事的有效结合。⑤《蒙古民族通史》视角之独到、史料之丰富、论点之精深，使该著作成为这一时期的经典之作。进入 21 世纪，得益于文献资料的更新，科研队伍的扩大，地区开垦历史、城镇和村落社会的形成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不断推进。这一时期显著的特点是成果多于以往任何时期，研究内容更加细化，视角更加开阔。

与开垦历史相比较，清代内蒙古地名的研究相当滞后。垦地与地名，同为人们在特定地理空间上的活动轨迹及其标记。换言之，垦地是地理空间的实体，地名是该实体的名称、代号，地名是用语言文字来表现和记录地理实体的，两者实为一体，密不可分。人们赋予地理实体之名称，仅仅数字数语，却可包含许多信息。地名所包含的信息，可能表现地理空间的形态、位置，也可能描绘人文特色，或可能蕴含起名者的属性、意愿和观念。就清代内蒙古土地开垦而言，长期以来的研究多关注开垦实体及其变迁，却忽略该实体名称的来历和变化。忒莫勒的《土默特地方蒙古语地名初探》一文是 20 世纪末一篇开创性尝试，从部落时代的遗存、农业移民、不同方言加以解释当今呼和浩特地区的若干历史地名，同时纠正以往的错误解读。笔者《开鲁与鲁北——同一时期不同背景下形成的两个城镇》一文，通过引用档案资料和游牧图，探讨当今内蒙古东部的“开鲁”和“鲁北”二镇名称的来历和含义。⑥ 当然，历史地理方面的一些论著，也有涉及地名者，因并非专门研究，兹不列举。

一、清代内蒙古行政建置与建置名称概况

从雍正元年（1723）开始清廷在内蒙古蒙旗开垦地方设行政建置，日后向各垦地推广。最早设置的是厅，后又陆续设置道、府和县，直到清末，共设 27 厅、20 县、3 州 6 府 5 道。如关

① 土默特地区土地的开垦、农耕村落的形成，以及大量村落名称的出现，始于 16 世纪。忒莫勒《土默特地方蒙古语地名初探》认为：“明清以来，土默特地方出现了大量的蒙古语地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口状况的变化，蒙古语地名逐渐被遗忘，代替它的常常是一些不规范的汉语音译：用当时当地的汉语土语口音，掐头去尾、顺口成词地音译蒙语，再创地名。”中国蒙古史学会编：《蒙古史研究》第 5 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239−260 页。

② 《内蒙古大学学报》1964 年第 2 期。

③ 刘海源主编：《内蒙古垦务研究》第 1 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 年，

④ 周清澍主编《内蒙古历史地理》系统叙述了内蒙古地区历代行政沿革。全书内容分五章，清代之前设“从远古到唐代的内蒙古地区”“辽夏金元明的内蒙古地区”等二章，清代之后设“清代的内蒙古地区”“中华民国时期的内蒙古地区”“建国以来的内蒙古自治区旗县级以上行政区划沿革”等三章。从所占篇幅足见清代内容之分量。周清澍主编：《内蒙古历史地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 年。

⑤ 乌云毕力格、成崇德、张永江：《蒙古民族通史》第 4 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 年；白拉都格其、金海、赛航：《蒙古民族通史》第 5 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 年。

⑥ 乌云格日勒：《开鲁与鲁北——同一时期不同背景下形成的两个城镇》，乌云毕力格主编：《蒙古学问题与争论》第 9 期，国际蒙古文化研究协会，2013 年，第 55−63 页。

注这些地方行政建置名称，就不难发现其内涵和历史演变。清代内蒙古行政建置名称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1. 以城市、关口、驿站名命名的：如归化城厅、归绥道、张家口厅、独石口厅、和林格尔厅。

2. 以历史时期的建置命名的：如长春厅（长春府）、五原厅、东胜厅。

3. 以自然湖河名命名的：如热河厅（热河道）、呼伦厅（呼伦道）、清水河厅。

4. 以音译非汉语地名命名的：如多伦诺尔厅、乌兰哈达厅、昌图厅（昌图府）。

5. 以蒙汉语混合语命名的：如洮南府、开鲁县、洮昌道、林西县。

6. 以意译地名命名的：如三座塔厅、赤峰县。

第 1 类中的归化城，约于明万历九年（1581）由土默特部俺答汗修筑于大青山以南，城名库库和屯，意为青色的城，明朝命名为归化城。清初在此编旗设佐，统一称为归化城土默特两翼；乾隆初年，在归化城东北数里之外建绥远城；乾隆六年（1741）设归绥道，其名取自归化、绥远二城。康熙年间，在内蒙古安设以长城中部五个关口命名的五路驿站。① 察哈尔游牧八旗南部开垦渐扩，雍正年间设三厅管理蒙古、民人事件，其中两厅便以关口张家口、独石口命名。第 2 类中的长春厅（长春府）、东胜厅，其名分别由辽代所设长春州、东胜州而来；五原厅，则来源于汉代所设五原郡。第 3 类中的热河原为河名，是滦河一支流，名武烈河，上中游有温泉注入，因而又称热河，清朝皇帝避暑胜地即建于此，使其成为地区之名；呼伦湖，史称阔连海子，雍正年间在呼伦湖、贝尔湖之地设索伦、巴尔虎八旗，俗称呼伦贝尔八旗。第 4、6 类地名的乌兰哈达和赤峰，为同一地名之不同语种称呼。该地在清代昭乌达盟翁牛特右翼旗境内，小山名为乌兰哈达（ulaγan qada），意赤色山峰。乾隆十三年，理藩院派理事司员驻翁牛特右翼旗境内，该官名乌兰哈达理事司员，② 乾隆三十八年在此地设厅，仍名乌兰哈达厅，五年后的乾隆四十三年改为县，将蒙古语地名乌兰哈达意译为赤峰，即以此为县名。多伦诺尔（doloγan naγur），意七个湖泊，在察哈尔游牧八旗左翼境内。康熙三十年（1691），清廷召集喀尔喀蒙古与内蒙古各旗王公会盟于此，史称多伦诺尔会盟。雍正末年设厅时便以此为名。第 5 类地名中洮南府的洮南，其意为洮儿河以南。洮儿河为嫩江右岸支流，源出大兴安岭东南麓，洮儿河（tuγur un γool），意桃儿河。洮儿，为河名的音译，恰好与桃儿谐音。光绪三十年（1904），在科尔沁右翼前旗洮儿河以南的垦地设府，便以洮南为府名。光绪末年官垦昭乌达盟东北部的扎鲁特左翼旗、扎鲁特右翼旗、阿鲁科尔沁旗等三旗游牧地，设开鲁县，三旗名称中都有“鲁”字，“开鲁”就是“开垦鲁字旗地”之意。第 6 类地名中的三座塔，来自古塔。在清代卓索图盟土默特右翼旗境内有古塔三座，当地蒙古人称古尔板苏巴尔汉（γurban suburγan），③ 其意为三座塔。乾隆初年派驻理藩院理事司员于此地，便名为三座塔理事司员。乾隆三十八年，设厅，仍名三座塔，乾隆四十三年厅改为县，取名朝阳。④

从以上概述可知，清代内蒙古行政建置的名称之来历、含义及其变化，各具特色，富有内涵，研究这些地名，显然是研究地方历史文化的一个很好的抓手。

---

① 《清圣祖实录》卷 154，康熙三十一年三月丙辰条载：“内大臣阿尔迪、理藩院尚书班迪等奉差往边外蒙古地方，五路设立驿站请训旨”；卷 155，康熙三十一年六月甲申条载：“议政王大臣等议覆，奉差安设口外五路驿站内大臣阿尔迪疏言，喜峰口外设立十五站，古北口外六站，独石口外六站，张家口外八站，杀虎口外十二站。”

② 《清代翁牛特右翼旗扎萨克衙门档案》，赤峰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1-142。

③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 535《蒙古统部·土默特》载：“三塔山，在左翼西三十里，蒙古名古尔板苏巴尔汉，上有辽金时所建三塔。”

④ 如今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有南北相距 300 米而立两座古塔，其东有另一古塔塔基。此为地名三座塔之来历。

二、科尔沁左翼后旗开垦的启动与昌图额尔克

在内蒙古东部地区，柳条边墙以外的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三旗、郭尔罗斯前旗率先进入开垦时代，开垦耕种起始时间可上溯到乾隆中后期。农业移民越过柳条边墙入辽河及其上游西辽河（西拉木伦河）、东辽河两岸的科尔沁左翼三旗和伊通河流域的郭尔罗斯前旗。乾隆四十九年，清廷下令将科尔沁左翼前旗的种地民人交铁岭县管理，科尔沁左翼中旗的种地民人交开原县管理。[①] 嘉庆五年（1800），郭尔罗斯前旗长春堡地方有民人 2 330 户，农业熟地 265 648 亩。[②]

科尔沁左翼后旗地处辽河平原的中部偏西，旗东南和南部靠近柳条边墙。移民进入该旗经营农业，始于嘉庆初年的 18 世纪末，此时正是清廷三番五次发布开垦禁令时期。垦地的进一步扩大和农业移民的管理，则是进入 19 世纪之后的事情。

嘉庆七年六月十四日理藩院上奏称科尔沁左翼后旗扎萨克多罗郡王和硕额驸索特纳木多布斋呈请在旗内常突额勒克地方招民开垦收租用于当差。此折不久奉旨获准。[③] 这一年科尔沁左翼后旗扎萨克招民开垦常突额勒克地方。《清仁宗实录》嘉庆十一年七月记载：

> 据称科尔沁该管旗界常突额勒克等处，自嘉庆七年奏准垦种闲荒地土，经今四载，流寓已有数万。……一切命盗、田产等事，自应设官经理，弹压稽查。著富俊等详悉会勘，或仿照吉林长春堡事例，妥议章程，另行具奏。[④]

以上两条关于常突额勒克的记载，记录了科尔沁左翼后旗土地开垦的起始时间、具体地点以及设官管理农业移民的过程。也就是说，嘉庆七年奏准开垦，其后经过四年，已有数万移民进入该旗。时任吉林将军富俊受命会勘，就在这一年，设置昌图厅。

新厅命名为昌图，这与《清仁宗实录》中的常突额勒克的“常突”必定有关，因为“昌图”和“常突”二字谐音。那么，最初奏准开垦之时，该地被书写为“常突额勒克”，它从何而来？而设厅之时，又为何改为昌图额尔克并取其前二字命名新厅？

关于科尔沁左翼后旗开垦事宜，除上述奏折和《清仁宗实录》记载之外，在《大清会典事例》和《理藩院则例》中分别有三条记载，其内容完全一致，排序却有所不同。

《大清会典事例》卷 978《理藩院・户丁》、卷 979《理藩院・耕牧》分别记载：

> 嘉庆十一年议定，昌图额尔克地方，东至吉林边栅，西至辽河一百余里，南至威远堡边界，北至白塔水河二三十里、四五十里不等，设理事通判一员，办理农民一切事件。[⑤]
>
> 十六年议定，昌图额尔克地方所开地亩，每年征收租息，赏给该郡王一半，其余一半，照郭尔罗斯种地之例，合计该旗台吉、官员、兵丁户口数目，均匀赏给。[⑥]
>
> 十七年定，科尔沁左翼后旗扎萨克郡王旗昌图额尔克地方，西自辽河起，东至苏巴尔汉河止，一百二十里；北自太平山起，南至柳条边止，五十二里；西至柳条边十六里，东至柳条边二十里，准其招民开垦。[⑦]

---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978《理藩院・户丁》载：乾隆四十九年“奏准，科尔沁地方种地民人与蒙古有交涉事件，所有宾图王地方游牧商民，住址近铁岭县，即交铁岭县管理。达尔汉亲王地方游牧商民，住址近开原县，即交开原县管理。如有词讼案件，该县呈报盛京刑部、将军会同核办”。

②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978《理藩院・户丁》。

③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理藩院奏称科尔沁空地招民开垦纳租折》，嘉庆七年六月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本文所引档案，均藏该馆），档案号：03-0197-3641-037。

④ 《清仁宗实录》卷 164，嘉庆十一年七月己未。

⑤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978《理藩院・户丁》。

⑥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979《理藩院・耕牧》。

⑦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979《理藩院・耕牧》。

《理藩院则例》卷 10《地亩》记载：

增纂 昌图额尔克地方准其开垦

科尔沁左翼后旗扎萨克郡王旗昌图额尔克地方，西自辽河起，东至苏巴尔汉河止，一百二十里；北自大平山起，南至柳条边止，五十二里；西至柳条边十六里，东至柳条边二十里，准其招民开垦。

增纂 昌图额尔克地方农民事件设官管理

昌图额尔克地方，东至吉林边栅，西至辽河一百余里，南至威远堡边壕，北至白塔水河，二三十里、四五十里不等，设理事通判一员，办理农民一切事件。

增纂 昌图额尔克地租赏给该旗官兵一半

科尔沁左翼后旗扎萨克郡王旗昌图额尔克地方所开地亩，每年征收租息，赏给该郡王一半，其余一半，照郭尔罗斯种地之例，合计该旗台吉、官员、兵丁户口数目，均匀赏给。[①]

清前中期蒙旗游牧地的开垦，通常经历招垦、设置、征租等步骤，上述二书也印证了这一点。不难看出，《大清会典事例》第三条嘉庆十七年议定内容和《理藩院则例》第一条增纂内容一致，而二者正是记录了科尔沁左翼后旗土地招垦步骤。如果结合上文所引用的嘉庆七年满文奏折和嘉庆十一年《清仁宗实录》所追述嘉庆七年事情，可以判断《大清会典事例》第三条议定条目的年代有误，它应当为嘉庆七年，而不是嘉庆十七年，"十"为衍文。但这条误载导致本是嘉庆七年议定的事情被写成嘉庆十七年之事，似乎说明垦殖在先、招民在后。这在清末之前的蒙旗开垦历史上是几无可能的事情。

对科尔沁左翼后旗开垦中心地，二书均记为"昌图额尔克"。这表明，嘉庆十一年设置昌图厅之时，对蒙旗垦地原地名的汉文音译，官方作了相应调整，字面上把"常突额勒克"改为"昌图额尔克"，而新设的厅名取其前二字。对地名文字的调整，不仅仅体现在汉字上，同样也体现在满、蒙古文译文上。《理藩院则例》(道光本)的满文译本作"cangtu erke"，已不再是嘉庆七年满文奏折中的"cangtu elke"，蒙古文译本作"čangtü erke"，也不再是《清仁宗实录》(蒙古文本)的"čangtü eleg"。对此后文专门分析，兹不展开。

三、科尔沁左翼后旗新垦地与库都力

科尔沁左翼后旗新开垦地从昌图厅向北、向西不断扩大。道光年间到光绪初期是另一处垦地的开辟、扩大和地方行政建置的设置时期。新垦地名库都力，道光初年，旗内台吉在这里私行招民开垦。

道光九年七月初二日的一份奏折记录了科尔沁左翼后旗私行招垦之事。[②] 私行招垦的当事人为科尔沁左翼后旗的几名台吉，他们前后两批招民开垦。第一批招垦人是那沁、白果仓，时间在道光四年至六年之间，招垦地方为库都力。此地为"因年久草枯水涸不足养牲"的马厂，"东至硕勒合硕，西至姑奈住勒克，南至昌图，北至呼得力甸子，东西长一百九十余里，南北东宽四五十里，中宽五六十里，西宽二十里"，可见范围较大，昌图在其南边，说明道光年的私垦就是在嘉庆年所形成的垦区以北推进的。

第二批私垦时间为道光六年，招垦人中有第一批私垦涉案人员白果仓的父亲嘎鲁底、台吉白音图等人，他们收押荒钱文，"将库都力界内哈拉海甸子处荒地写与民人李亭开二千七百五十天"。这里除招垦人外，还出现了承领人，并且记录以天为计算单位的垦地面积。

据《清宣宗实录》道光八年九月壬寅条记载，盛京将军奕颢派员调查科尔沁左翼后旗私招

① 《理藩院则例》卷 10《地亩》。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长龄奏为查明科尔沁台吉等私招民人开垦牧场一案》，道光九年七月初二日，档案号：03-9543-068。

流民一事，查得“共有一千四百余户”，奏请将这些携眷种地度日的无业贫民容留当地。另据《清宣宗实录》记载，针对理藩院上奏，道光九年七月道光帝令盛京将军派遣妥员，会同哲里木盟长委派之人到库都力，“将库都力等处四址挖立封堆”。又命昌图厅对“民人籍贯、户口及承种地亩数目”造具细册报明理藩院，“并出示严行晓谕该蒙古、民人嗣后不得任意私招私垦，令该盟长一体遵办”。①

科尔沁左翼后旗的私行招民，并没有因盛京将军再度派员调查和道光帝的“不得任意私招私垦”命令而停止。三年后的道光十二年，库都力地方的私垦问题又受到关注。这一年三月，科尔沁左翼后旗扎萨克郡王僧格林沁查知台吉那沁等在原奏界址以外私招民人三百余户。所谓原奏界址，指的是道光九年在库都力四址所划界限。旗衙门一方面拘拿管押涉案台吉，另一方面令民户速行搬移，但是民户“因众台吉使用伊等押荒钱文”而并没有搬走。五月，盛京工部侍郎裕泰被派往事发地查办案件。② 一番调查之后裕泰拟出八条章程于道光十二年七月上奏。③

科尔沁左翼后旗私行招垦一事，被统治者视为典型案例。议准裕泰上奏的章程，日后载入了各种官书之中。作为道光十二年七月丁巳日的重要事项，载入《清宣宗实录》；作为重要条例，编入《大清会典事例》道光十二年条目；④ 章程更加具体的内容，作为“续纂”条目，写入《理藩院则例》。⑤ 大体而言，《实录》和《大清会典事例》中的记载基本相同，二书省略了具体的地名、范围和招民户数，而《理藩院则例》恰好补记二书所省内容。《理藩院则例》所记章程第一条就是《实录》《大清会典事例》所省内容。主要内容可归纳如下：第一条为库都力地方所开荒地，东至硕勒合硕，西至姑奈经勒克，南至昌图，北至库都力甸子。计原招民人一千四百余户，从界外改移民人三百余户；第二条到第八条的基本内容，三书相同，分别制定一亩地的面积、起租年限、大租和小租的额度、租地合同、私招私垦治罪、垦地内旗民经营土地要求、地局职责、革除揽头决定等。

总之，道光十二年的奏折记录了库都力地方招民开垦的过程，而各官书则记录了库都力地方私垦事件的处理结果。也就是说，库都力地方，从道光初年开始开垦，到道光十二年由旗扎萨克出面处理，朝廷专门派遣官员进行清查，结果形成了上文所示章程所定各条内容。

四、昌图额尔克和库都力的地名释义

科尔沁左翼后旗自行招民开垦始于嘉庆初年，如上文所述在嘉庆、道光年间几乎不间断地推进。移民人数和开垦面积达到一定规模之时，官方的地方管理系统正式启动，不久设厅派官，管理诸事。

昌图额尔克、库都力两地当为科尔沁左翼后旗垦地上的标志性地方。昌图额尔克，位于科尔沁左翼后旗东南部平原，距离郡王府二百四十里。作为地理实体名，始入时人眼帘，是该地从传统游牧社会转向农耕社会之初。当时科尔沁左翼后旗的扎萨克为索特那木多布斋，嘉庆元年，他被刚即位的嘉庆帝选为和硕额驸，嘉庆六年，与庄敬公主成婚。⑥ 次年，该扎萨克就上呈招民开垦的请求，他的请求通过理藩院上奏皇帝并获批准。此后昌图额尔克多次被各种文字记

① 《清宣宗实录》卷 142，道光八年九月壬寅；卷 158，道光九年七月甲午。

② 《宫中档朱批奏折》,《奕颢奏为审明逸犯李亭开拒捕杀差科尔沁郡王旗台吉那沁等私行招民垦荒分别按例定拟事》，道光十二年闰九月初二日，档案号：04-01-22-0054-001。

③ 《清宣宗实录》卷 215，道光十二年七月丁巳。

④ 参见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979《理藩院 · 耕牧》的“查勘科尔沁旗垦荒地界章程。”

⑤ 参见光绪《理藩院则例》卷 10《地亩》的“道光十二年清查科尔沁郡王旗开种库都力地亩专条”。

⑥ 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46 页。

录下来。在这片垦地上，嘉庆十一年（1806）设昌图厅。作为地名的昌图额尔克，至此退出时人注意。光绪三年（1877），昌图厅升为府，昌图已成为“奉省北边外之巨堡”。① 入民国后，昌图府改为县。作为行政区划名称，昌图沿用至今。

关于地名“常突额勒克”和“昌图额尔克”，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有满文奏折和满、蒙古、汉文文献。嘉庆七年的满文奏折作 cangtu elke，这是已知最早的记录。道光年间编修的《清仁宗实录》汉文本中作“常突额勒克”，蒙古文译本作 čangtü eleg。② 从《清仁宗实录》的音译推测，嘉庆七年开垦启动时该地名汉文音译可能就作“常突额勒克”，只是尚不见当时的汉文档案。而《清仁宗实录》蒙古文译本中的书写 čangtü eleg，应当为从汉文本的“常突额勒克”再音译为蒙古文的结果。因为在原字意不明确的前提下，“常突额勒克”至少有三种对音可能，即 čangtü eleg、čangtü erke 和 čangtü ergi。

据以上所述，将地名昌图额尔克在不同文种文献中的不同书写及其变化可归纳如下：

目前所知最早的记载是嘉庆年间的满文档案，写作 cangtu elke，之后是汉文音译“常突额勒克”，再后为蒙古文 čangtü eleg；道光年间设厅时汉文音译改为“昌图额尔克”，满文和蒙古文分别又写作 cangtu erke 和 čangtü erke；清末地方文书又常写作“昌图额勒克”。③ 从书写形式看，该地名由两个词组成，前半为“昌图”（常突），后半为“额尔克”（额勒克）。汉文“昌图”（常突），以及满文 cangtu、蒙古文 čangtü，三者读音相同，因此可以断定，“čangtü”应该就是原蒙古语地名前半部的准确读音。清末《昌图府志》在昌图府的“蒙汉名别”中记载：昌图府，蒙古名常突额勒克，“常突与昌图，盖一声之转”。④ 这是目前所找到的对汉文音译“常突”与“昌图”加以对比的唯一记载。而蒙古文 čangtü 一词，还不得其意。后半的“额尔克”（额勒克），与其对应的蒙古文很有可能是 ergi，该词在现代蒙古语中有两种解释，其一指斜坡状河岸，其二指沙地、山岭、河流等的陡峭状沿边。民国初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员在哲里木盟各旗进行调查，从当地蒙古人询问到：“常突为昌图的旧名，额勒克指蒙古语的沙地，[昌图额勒克——引者] 即为昌图沙地之意”。⑤ 关于昌图额勒克（昌图额尔克）地名含义，这是目前所知唯一的解释。而这一解释为上文所推测的“额尔克”为蒙古语 ergi 提供了旁证，可以确定“额尔克”就是形容那一片地理实体的自然面貌。

库都力是继昌图额尔克之后又一个引起时人关注的地名，有清一代，它同样被记录在大臣奏折、《清实录》、《大清会典事例》和《理藩院则例》（汉、满、蒙古文本）中。据目前所掌握的记录，其汉文在奏折中有两种写法，一作库都力，另一作呼得力；在《清实录》《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则例》等官书中，均作“库都力”。其蒙古文在《清宣宗实录》中有两种写法：一作 küdüli 或 ködüli，另一作 küdür 或 ködür。⑥ 按蒙古文规范书写，字首的 kü 或 kö，应有长牙，而此处 kü 或 kö 无长牙，这必定是因翻译人员直接采用了满文 ku 的书写形式所致。可与《清宣宗实录》蒙古文本相对比的是满、蒙古文《理藩院则例》中对该地名的不同书写，在道光二十三年满文《理藩院则例》中作 kuduli，同年刊行的蒙古文《理藩院则例》中作 küdüli 或 ködüli⑦，字首 kü 或 kö 有长牙，符合蒙古文规范写法。仅从字面看，汉文“库都力”、满文

---

① 《奉天通志》卷 90《建置 · 廨署》。参见王树枏、吴廷燮、金毓黻等纂：《奉天通志》第 2 册，沈阳古旧书店，1983 年，第 2058 页。

② 那顺乌力吉整理：《清朝蒙古实录》第 4 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1 年，第 711 页。

③ 如《东三省政略》卷 2《蒙务下 · 筹蒙篇》：“昌图府，科尔沁左翼后旗牧地。嘉庆七年奏准开垦”，“十一年，以昌图额勒克地方设理事通判”。见徐世昌等编纂：《东三省政略》上册，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年，第 456 页。

④ 洪汝冲纂修：《昌图府志》不分卷《疆土志 · 沿革》，宣统二年（1910）铅印本。

⑤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编：《蒙地》，满洲旧惯调查报告，1914 年，第 11 页。

⑥ 那顺乌力吉整理：《清朝蒙古实录》第 5 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1 年，第 270、312 页。

⑦ 《理藩院则例》卷 10《地亩》，道光二十年满、蒙古文刻本。

kuduli、蒙古文 küdüli 或 ködüli，读音基本相同。但是，蒙古文无论是 küdüli（ködüli），还是 küdür（ködür），其意皆不明。上文提及的道光九年和十二年的奏折中描述库都力地方为："原系马厂，因年久草枯水涸不足养牲"，"实系遗弃马厂闲荒"，"即系马厂移出之闲荒"，"现在流民居住之地东至硕勒合硕，西至姑奈住勒克，南至昌图，北至呼得力甸子，东西长一百九十余里，南北东宽四五十里，中宽五六十里，西宽二十里"。这些均表明库都力为放马牧场，呈细长形状，牧场东边至硕勒合硕，① 是科尔沁左翼后、中二旗边界，西边至姑奈住勒克，② 是科尔沁左翼后、前二旗边界，牧场北边的一个地方名为库都力（呼得力），其以南和以北，均属于科尔沁左翼后旗。这样一处放马牧场，经历道光初年科尔沁左翼后旗台吉们屡禁不止的招民开垦之后变成了农业区。《昌图府志》记载，道光元年，昌图厅在梨树城设分防照磨，梨树城蒙古名为"库都勒甸"。③ 梨树城，为清代科尔沁左翼中旗地，其蒙古名"库都勒"与"库都力"近音，是否同指一地，或是同名地，尚不得而知。④

除此之外，蒙旗早期划界相关的一条记载，似乎可追溯"库都力"更早的历史。《清太宗实录》记载，天聪八年（1634）十月，阿什达尔汉、达雅齐二人被派往蒙古地方，在硕翁科尔地方与蒙古各部落大小诸贝勒会盟。会盟的一项重要目的为给蒙古各部划定牧地及其边界：

> 合计地界大势，西南至噶古尔苏，西至纳喇苏台，西北至哈尔占，北至胡喇虎、克里叶哈达、巴噶阿尔合邵、札噶苏台、杜木大都藤格里克、塔喇布喇克、诺绰噶尔，东北至纳噶台，东至兀蓝达噶胡里也图，东南至哈尔巴噶尔，南至多布图俄鲁木、胡得勒、乌讷格图莽喀、布木巴图、胡鲁苏台、古尔班克谷尔、库痕哈喇合邵、噶海、茅高阿大克、门绰克、什喇虎敖塔孛罗、兀喇汉哈达等处。⑤

诸地名中的"多布图俄鲁木""胡鲁苏台"二地，有学者考证前者在清代科尔沁左翼中、后二旗边界附近，后者在科尔沁左翼后旗境内。⑥ 另有"胡得勒"一地，据上文所记范围，位于"多布图俄鲁木""胡鲁苏台"二地之间，可以推断该地当在清代科尔沁左翼中、后二旗交界之处或在后旗境内。如果这一推断成立，"胡得勒""库都力""呼得力"，应当同指一个地方。因为三地名不仅地理实体的大概位置相互吻合，地名的汉文音译也相当接近。如果复原蒙古文地名，至少有三种可能，分别为 kötül、küder、küderi。第一意为两山之间的平缓之地；第二有两个含义，一意为强壮结实，二指一种金属；第三为一高原动物名。

五、结语

清代内蒙古开垦地方不断出现新地名。从本文探讨的内容可知，一些地名能够溯其源头，一些地名却名不见经传，因开垦的推进而初见，却又因记录文字和表述方式的不同而不能复原，

① 硕勒合硕，《哲里木盟嫩科尔沁十旗游牧划界地图》作 šilun qošiγu。该地图收藏于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档案馆。

② 前引《军机处录副奏折》"奏为查明科尔沁台吉等私招民人开垦牧场一案"中作"姑奈住勒克"，《理藩院则例》（道光二十三年本）作"姑奈经勒克"；《哲里木盟嫩科尔沁十旗游牧边界地图》未记该地名。笔者认为，《理藩院则例》有误，奏折的书写应该更接近原地名，拉丁文可转写为 gegöü –yin jülge, 意为放母马之草地。库都力地方原为放马牧场，其中一段专放母马，是有可能的。

③ 洪汝冲纂修：《昌图府志》不分卷《疆土志·沿革》。

④ 梨树城西南距昌图四十余里，相关地方志均记其为科尔沁左翼中旗地。但考察清代科尔沁左翼前、中、后三旗间的旗界和争地纠纷，梨树城的地理位置和道光元年昌图厅分防照磨的派驻等，还不能排除梨树城原为科尔沁左翼后旗之地可能。若是，可以断定"库都勒"就是与"库都力"同指一地。

⑤《清太宗实录》卷 21，天聪八年十一月壬戌。

⑥ 萨出日拉图：《后金指授归顺蒙古诸部游牧地考述》，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 9 辑，科学出版社，2017 年，第 23−39 页。

不得其意。昌图额尔克和库都力二地名，就是后者中的典型例子，在官方文书和地方志中有不同记录，却没有更具有说服力的蒙古文文献可提供有效线索或佐证依据。文献中的地名，尽管文字的书写不尽相同，但确实记录和保存了地理实体的人文历史变迁和文化记忆片段。就昌图额尔克而言，存在不同文种的书写形式，其名始见于嘉庆七年的奏折中，五年后设置昌图厅，从此以“昌图”之名融合于地方农业社会。尽管如此，在清末民初时，仍有人称其为“常图额勒克”“昌图额尔克”，① 这足以表明地名长期的实用与传承功能。另就库都力而言，上文所提《清太宗实录》中的“胡得勒”，与后世文献中的“库都力”“呼得力”同指一地的可能性很大，它当属辽河平原上保留较长历史记忆的地名之一。

与昌图额尔克、库都力类似的历史地名，在内蒙古各地绝非少数。它好比一个隐藏的宝库，尘封于不同的文献之中，值得对其进行挖掘和解释，从历史学、文献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讨论其学术意义。它们不仅仅见证了蒙旗编旗划界的早期历史，游牧转向农耕社会及其变迁，更重要的是，它以独特角度记载不同民族间的互动和交流，不同文化间的交融，呈现清代以来内蒙古地区人、地方、社会多层次的历史进程。

References

Tuyimer. “Tumote diqu mengguyu diming chutan” (A study of some mongolian place−names in the tümed area) , *Menggushi yanjiu* (Studia historica mongoliaca) 5 (1997).

Oyungerel. “Kailu yu Lubei: tongyi shiqi butong beijing xia xingcheng de liangge chengzhen” (Kailu and Lubei—Two towns formed under different backgrounds in the same time period). *Mengguxue wenti yu zhenglun* (Quaestiones Mongolorum disputatae) 9 (2013).

Du jiaji. Qingchao manmeng lianyin yanjiu (A study on the marriage between Manchu and Mongolia in Qing dynasty). Renmin chubanshe (2003).

Sacuraltu. Aixinguo zhishou guishun menggu zhubu youmudi kaoshu (An inspection and narration of *Aisin Gurun*’s granting herding lands to *Mongol* tribes that had pledged allegiance to the state). *Xiyu lishi yuyan yanjiu jikan* (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studies of China’s Western Regions) 9 (2017).

Land Reclamation and Place Names of Eastern Inner Mongolia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Examples of Changtu Eerke and Kuduli, Left Wing Qorčin North Banner

Wuyungeril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uyungerel2015@163.com)

Xiawenchao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xiawenchao2018@126.com)

Abstract: The reclamation of a large area of nomadic land in the Left Wing Qorčin North Banner was completed during the Jiaqing and Daoguang reigns in the Qing Dynasty, a period when the Qing government repeatedly issued reclamation bans. Therefore, the initia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reclamation of the banner lands had always been accompanied by records of court approval and official supervision. These records include, not only special memorials, but also important information that was subsequently recorded in the *Qing Veritable Records*, and many regulations governing reclamation of the banner lands were compiled as official ordinances. Focusing on the land reclamation of Left Wing Qorčin North Banner,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two symbolic place names which were recorded differently in Manchu, Han and Mongolian books - Changtu Eerke and Kuduli. The article explains the reason for different place names and addre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researching place names.

Keywords: Qing Dynasty, eastern Inner Mongolia, cultivated land, place names

① 洪汝冲纂修:《昌图府志》洪汝冲作“昌图志序”。程道元修，续文金纂:《昌图县志》续文金作“昌图志序”，民国五年（1916）铅印本。